

中国教育是否会拖经济增长后腿?



数据显示,在2006—2010年间,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吸纳了全世界97%的移民发明家,他们固然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但也有不少来自其他发达国家。来自中国的移民发明家占比最高,达16.3%,其次是印度,占12.1%。但来自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总人口6亿)的只有2.7%,来自非洲(总人口11亿)的只占1.7%。

■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民收入达到世界中上等水平,中国似乎必须走上一条以创新驱动的增长之路。但是创新需要人才,创新驱动的增长能否承担起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呢?换句话说,中国教育是否会拖经济增长的后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很多人那里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应试教育向来为人诟病,学生负担过重、死记硬背、缺乏创造性等批评已成为普遍的社会共识。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学术界却有不少学者在解释中国(奇迹)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又将重视教育作为一个主要原因——毕竟,如果中国教育真的一无是处,那就很难理解何以恰恰是中国成了过去三十多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一贬一褒,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究竟孰是孰非呢?

中国的教育质量如何?

如果说教育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决定因素的话,那么所有国家都该重视教育,中国(东亚)在这方面能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事实上,从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来看,中国直到最近几年才刚刚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教育支出的比重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则与中国差不多。所以,从政府教育支出的角度看,东亚地区并不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加重视对教育的投资。从衡量教育水平的一个常用指标——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中国只是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

但是,一个国家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只是体现了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并不一定能反映普通国民有多重视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不绝对反映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毕竟一个人上多少年学与他学到多少东西总是不一致的,教育的质量与数量起码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

那么,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呢?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哈努谢克(Hanushek)和德国慕尼黑大学的沃斯曼(Woessmann)两位经济学家利用国际性的(中小学)数学、科学和阅读考试成绩的数据,构建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70多个国家的所谓“认知技能”(cognitive skill)指数,通过比较各国同龄的学生在相同的受教育年限里所获取的知识和技能的多寡,来衡量各国教育质量的高低。根据他们的数据,所有东亚国家(地区)的认知技能指数都名列

前茅,更是遥遥领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人均教育年限关系不大,而与教育质量高度正相关。例如,菲律宾的人均受教育年限2010年时是8.95年,高于中国的8.11年,与新加坡的9.13年非常接近(2000年及之前还高于新加坡),但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则远低于中国和新加坡。如果比较三个国家的认知技能指数,新加坡是5.33,中国是4.94,而菲律宾只有3.65(作为对比,美国是4.90,最低分是南非的3.09)。

很多读者也许会觉得说中国教育质量很高(甚至高于美国)是个笑话。但这里所讲的教育质量比较的是相同年龄的(中小学)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技能的多寡,例如同样是九年级(即中国的初三、美国的高一),中国学生的认知技能要略高于美国,更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却远低于美国,以2010年为例,中国是8.11年(相当于初二),属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是13.09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为世界第一。故综合起来看,中国的教育水平与美国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中国人只会考试吗?

许多人会说考试成绩好就说明教育质量好,中国人(东亚人)就是会考试,不见得有更多的真才实学,更谈不上有多少创新能力。可是,东亚国家培养出来的学生真的就那么会考试的拉美、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学生反而比很会考试的东亚学生更有创造力?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虽然高分不见得高能,低分也不一定低能,但是高分低能者一定远远少于低分低能者。毕竟,很多人认为创造力更强的欧美发达国家学生的国际考试成绩要比(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高。其实,无论是人均发明专利还是人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已经世界领先;文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创新水平和能力也已将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抛在后面,并正在迅速追赶发达国家。

我们在批评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的时候,都是将中国的现状与发达国家做简单、静态的类比。确实,中国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但这不是因为应试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力,而是因为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科研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人均科研经费等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中小学乃至本科基础教育质量

太差,而是因为我们的(属于非应试教育阶段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水平还远不如发达国家。而这又归咎于我国高校教师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普遍较低(但又高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多优秀的学生出国深造后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国内收入水平和科研条件上的差距)而没有回国。所幸的是,这种状况近些年来正在迅速得到改变。

中国大学的毕业生一旦去了西方研究型大学继续学习,他们的创新能力绝不亚于其他国家的同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做的一项以移民发明家(inmigrant inventors)为对象的研究很能说明问题。所谓的移民发明家指的是那些以外国人身份在居住国申请发明专利的科研人员,例如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科学家以美国居民(resident)的身份申请了发明专利,就是个移民发明家。数据显示,在2006—2010年间,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吸纳了全世界97%的移民发明家,他们固然很多来自发展中国家,但也有不少来自其他发达国家。来自中国的移民发明家占比最高,达16.3%,其次是印度,占12.1%。但来自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总人口6亿)的只有2.7%,来自非洲(总人口11亿)的只占1.7%。原因显然不是这些国家的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发达国家学习和工作,而是本来就没有很多这样的人才。

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中国(和印度)的人才外流严重(世界上除了美国、瑞士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有较多的人才净流入,很多国家都存在发明家人才净流入的问题,包括英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发达国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很多发达国家愿意吸引的人才(而不是他们想要拒之于门外的非法移民)。毕竟这些海外的中国移民发明家几乎都是在国内接受的中小学和大学教育,中国的应试教育显然没有扼杀掉这些人的创造力。中国虽然流失了这么多发明家人才,甚至是最优秀的一些人,但是留在国内(以及从海外回国)的人才还是多到足以让中国成为过去二十多年来创新水平增长最快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

决定一个国家教育质量最关键的因素可能不是政府愿意花多少钱,而是普通家庭有多么重视教育?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也不只是体现在开支上,而更可能体现在家长和孩子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学习上。世所公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地区)的家庭特别重视教育,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

是为了孩子的“钱途”吗?现在经常讲教育是最好的投资,但如果重视教育只是因为有利可图的话,那么别的国家的家庭不也会同样重视教育吗?

中国(东亚)人重视教育通常归功于儒家传统文化。但是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出发点并非功利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给个人和国家创造经济利益,因此所重视的不是学习有用的技能,而是学习四书五经、仁义道德。中国的科举制度只是强化了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使得受教育、有知识成为光荣、体面的事。毕竟能够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这是学习的唯一目的的话,那教育就是一个风险太高的投资,无异于现代社会想要通过买彩票来发家致富。

除了儒家文化以外,犹太文化也以重视教育著称,出发点也非经济利益。犹太教在大约两千年前就规定所有的父亲都必须在儿子六七岁时送他去上学,让孩子们学会阅读希伯来圣经,犹太人也因此成为识字率最高的民族。在古代农业社会,送孩子上学识字并没有经济上的回报,反而是个负担,所以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因此脱离犹太教而转信别的宗教。基督教新教文化也颇重视教育,这是因为马丁·路德在五百年前发起新教改革运动时就要求每个基督徒能够自己阅读圣经,新教徒也因而比天主教徒识字率更高。

由于教育存在所谓的“外部性”(即受教育的人不只是为了个人收入会提高,还会给他人或社会创造更多收入),因此,如果大家只是从个人经济利益的角度来决定接受多少教育、花多少功夫学习,结果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要求一定是存在差距的。政府可以提供免费教育,但接受免费教育的人不一定会用功读书。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有多勤奋,而这并不是政府花钱能够买到的,需要有超越于个人经济利益之外的动力。儒家文化、犹太教和基督教新教文化就恰恰赋予了教育以超越于功利之价值,使得接受教育、勤奋学习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规范,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近代之前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更谈不上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重视教育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并没有让中国成为现代科学的发源地,恰恰相反,科举制度以及对学习儒家经典的热衷也许是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但是重视教育的文化精神一旦用到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上,其所迸发出的力量使得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一点与犹太人的情况颇为相似。犹太人重视教育的本意是为了学习宗教经典,不是掌握实用的知识,所以犹太人对近代科学革命并没有什么贡献。但是犹太民族一旦将他们的学习热情转移到世俗的科学技术上,一两代人之后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产生了众多杰出的科学家。可以预期,几十年后,世界一流科学家的名单里也一定会有许多中国人的名字。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重视教育的文化是个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中国教育由于过度关注应试科目的学习,因此,有益于学生身心健康的体育、文艺及各类群体和社区活动常常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众多学子也在埋头苦读中牺牲了青少年所应享有的快乐时光。这些问题在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日本以及所有的海外华人群体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国的学生的确太辛苦了,但也造就了中国超高的基础教育质量,为中国走上创新型的增长之路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市场共识认为,人民币入篮成为了储备货币之一之后,别国的央行势必增持人民币。这是对SDR篮子货币的误解。最好的例证就是看看澳元和加元,这两个货币都不在SDR篮子里,但是它们在全球央行的非黄金储备资产中占据大约1—2%的比重。也就是说,SDR入篮与否,与别国央行是否增持人民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储备的危机和新世界秩序

■ 洪灏 交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

人民币进入SDR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市场共识对这次历史性事件的重要性,聚焦在人民币入篮之后,将带来的新增外汇流动性和长期对中国债市发展的推动。

毋庸置疑,这些都是人民币进入SDR后带来的重要的格局性的变化。然而,人民币入篮对于中国货币政策最终迈向独立有着更加深远的意义。在以美元为全球货币体系的核心地位被撼动之前,美国的货币政策和美元走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全球的经济格局——尤其在2016年美联储已进入加息周期。在这个背景下,人民币与美元逐渐脱钩,中国央行货币政策逐渐相对独立,将提高中国在危机时刻的应对能力。

市场共识认为,人民币入篮成为了储备货币之一之后,别国的央行势必增持人民币。这是对SDR篮子货币成员,储备货币以及央行储备资产管理的误解。最好的例证就是看看澳元和加元,这两个货币都不在SDR篮子里,但是它们在全球央行的非黄金储备资产中占据大约1—2%的比重。也就是说,SDR入篮与否,与别国央行的增持人民币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从SDR的总量和人民币的比重导出的增量资金的流入的估算并推论人民币汇率要走强逻辑并不正确。

美元霸主地位并不是一夕而成的。在上世纪70年代,法国收回了储存在美国所有的黄金储备之后,后者迫于国际黄金赎回的压力,正式宣布与黄金脱钩。而“美金”称谓也逐渐被“美元”取代。这一次伟大的实验其实对全球之后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毕竟,一个以黄金为核心的货币系统时刻面临着不是通缩就是通胀的危险。

这是因为黄金的开采量和世界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实体经济的增长远远地快于黄金时,黄金供应的瓶颈成为了通缩的压力。而当黄金供应被意外发现的时候,如当年欧洲大陆发现了美洲的金矿,资产和商品则面临着价格泡沫化的危险。在美金变成了美元之后,美联储逐渐地成为了世界的央行,为全球经济的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

但是全球储备货币的角色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拥有储备货币的国家不仅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充足的农业和自然资源,还要有魄力不惜让本国的经常性账户在危机的时候,剧烈的扩张以补充和维护全球系统流动性——也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论。这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期,在连黄金的价格也随着危机的恶化而暴跌的时候,美元却强势升值。就此看来,全球的货币体系里暂时还没有货币可以取代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元指数的走势有一个诡异的17年周期。在这个17年周期里,美元指数在前六年走强,然后在随后的十年里走弱。在该周期里,每一次美元强势见底,全球经济的某一个地区、国家甚至全球的峰值都会伴随着一波经济的石油危机,80年代中期的拉美危机以及2001年的9·11事件等等;在美元的强势见底、全球经济出现危机之后,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开始恶化,显示美联储开始担当世界央行的角色,向全球提供流动性。当前,美元指数再次接近100的整数关口。而美元的强势恰恰维持了6年。

我们可以把美国的经常性账户的赤字,作为国外储蓄流入美国的衡量。历史上,这个渠道主要通过中东的“石油美元”和中国、日本积累的外汇储备从美国的国债市场回流到美国国内。中国、日本积累的外汇储备可以称之为“中国美元”和“日本美元”。自从美国的页岩气行业发展,美国能源开始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出口之后,石油美元逐渐消失,石油价格暴跌,而中东产油国也陷入了财政困境,中国、日本和中国外汇储备也开始下降,中国美元和日本美元也开始下降。这些历史上重要的美元流通渠道,或者说美联储向世界提供流动性的渠道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历史上每一次美元的强势和经常性账户的大幅改善,都可以视为国际流动性的收缩。而中东、拉美、亚洲、远东在70年代以来的历次美元强势的时候都依次被波及。如果以2016—2017年历史重演,那么中国必须考虑其应对的策略。而人民币逐渐与美元脱钩,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逐步独立,同时利率市场化都是增加中国应对系统性风险能力的重要策略。据此,人民币此次SDR入篮,以及中国从2014年以来推进的汇率改革,包括扩大波动区间和8月份的一次性贬值等等,都是中国应对未来一两年内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提前准备。

2016年注定将是风云变幻的一年。随着中国去产能,去杠杆和资本市场改革的深入,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各种变量将产生复合反应,出现一些没有历史先例的、因此也非常考验应对能力的波动。中国当前在汇率、利率、债券、股票和衍生品市场里的改革都将提高应对能力。如果我们的眼光如共识一般,只停留在几万亿或有新增债券流动性,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等等,那么可能忽略了森林,以及那森林里隐藏的机会。

外眼看中国

世行预警中国“未富先老”

世界银行(World Bank)12月9日警告,到2040年中国的劳动人口将减少逾10%,尽管中国已于近期放松了独生子女政策,这一警告突显人口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国面临“未富先老”的风险。

2012年,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定义为年龄介于15岁至64岁之间的人群)的数量数十年首度下跌——这个转折点对于劳动力成本以及政府和企业的退休金负担都有深远后果。

该人群数量进一步缩减10%,将等同于净减少9000万中国劳动人口,这一数字超过德国总人口,并与整个东亚面临的人口结构压力吻合。世行在北京发布的这份新报告显示,未来25年里,韩国、泰国和日本的劳动人口预计也将减少10%或以上。

“东亚经历的人口结构转变是我们见过最为剧烈的。”世行主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事务的副行长阿克塞尔·冯·特罗森博格(Axel van Trotsenburg)表示,“该地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临未富先老的风险。”

2010年,全球年龄在65岁或以上的人口,近40%(约2.11亿人)生活在东亚。世行估计,在未来25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将有至少12个东亚国家的65岁或以上的人口比例翻番至14%。在法国和美国,同样的人口结构转变分别经历了115年和69年。

中国政府最近放宽了1979年以来通过强制堕胎和绝育措施强制执行的名声不佳的独生子女政策,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此前,只有中国少数民族成员和头胎为女孩的偏远地区家庭才有资格生二胎。然而,这一政策放宽对于提高生育率和重振中国适龄劳动人口也许来的太迟了,因为抚养孩子的成本跟收入水平一同飙



升,尤其在大城市的中心。

“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生育率会降低。”世行报告的首席作者欧凯夫(Philip O'Keefe)表示,“鉴于中国目前的生育率,随着那些想要二孩的家庭又添新丁,人口可能会有暂时上扬,但我们看不到多大的长期影响。”

欧凯夫引用的调查显示,有资格生二胎的家庭中,只有1/4家庭事实上会这么做。

世界银行敦促东亚国家政府接受移民作为应对人口下降压力的一项措施,并指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口中超过20%是移民,新加坡人口中超过40%是移民。

“人口结构是发展中一股强大力量,但它并非命运注定。”欧凯夫说,“通过政策选择,政府可以帮助社会适应快速老龄化。”

(FT中文网)